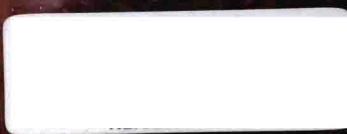


肖建军◎著

迷局

一个悬念重重的间谍故事
他是迷失方向的枭鹰
深陷无间道的漩涡
能否找到归途……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肖建军◎著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迷枭 / 肖建军著. —北京：金城出版社，2015.11

ISBN 978-7-5155-1297-6

I. ①迷… II. ①肖…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51494号

迷枭

作 者 肖建军

出 版 人 王吉胜

责 任 编 辑 杨超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4.5

字 数 378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1297-6

定 价 49.80 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利泽东二路 3 号 邮编：100102

发 行 部 (010) 84254364

编 辑 部 (010) 64214534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目 录

- 001 楔子
- 005 第一章 公安部长亲批的叛徒案
- 022 第二章 “镜子”和“枭”
- 037 第三章 死亡，突如其来
- 050 第四章 四面追杀
- 064 第五章 两个“郑恩时”
- 077 第六章 深渊
- 098 第七章 阴差阳错
- 112 第八章 图圄之灾
- 127 第九章 越狱
- 142 第十章 “鬼脸太君”和“影武者”
- 157 第十一章 我是谁？
- 172 第十二章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 185 第十三章 交易
- 200 第十四章 危险的“猫眼”
- 219 第十五章 代号“归途”
- 238 第十六章 掌握秘密的医生
- 253 第十七章 迟到的忏悔
- 271 第十八章 死人也会开口

- 293 第十九章 “猫に小判”
308 第二十章 走不出的无间道
326 第二十一章 胜利就在眼前了吗?
344 第二十二章 最后的莫尔斯码
363 第二十三章 “我不是叛徒！”
- 385 尾声

楔 子

1945年4月14日。上海。

傍晚时分，阴霾笼罩着整个天空，蒙蒙细雨随风飘落，马路上一片昏暗，行人车辆稀少，路边的商店多数已经关门，一些坚固的大厦都被日军强征作为未来决战的工事据点，只有几家专卖日货的商店还在招揽生意，但是门口却聚集着一堆堆的乞丐。战争进入到第八个年头，这座昔日繁华的东方大都会已是百业萧条，民生凋敝，发电量只有战前的三分之一，每个星期，市内所有的街区都要轮到一个晚上无水无电，即使有电时，灯泡的亮度也只有一根蜡烛那么大，像鬼火一般幽暗。

一辆雪佛兰轿车驶到吴淞路的“三河屋”旅馆门口停下，这是一家由日本侨民经营的小旅馆，招牌和门面都不起眼。车门打开，一个中年男子下了车，他身材略显臃肿，戴着礼帽，拄着文明棍，腋下夹着一个公文包，一名随从模样的青年男子给他打着雨伞，两人一起走进旅馆。一个伙计从旅馆门口的柜台前迎出：“是佐藤先生吗？”那名随从点了点头。

就在这时，旁边的“美利”钟表店屋檐下突然飞出四条黑影，举枪向旅馆里猛烈射击。柜台前空间狭小，无处转圜，刹那间，那个中年男子和随从身中数枪，应声倒地。黑影中的一人进入旅馆，另外两人监视街道两端，一人控制住汽车，这些人动作娴熟，显然事先演练过。此时街道上已是大呼小叫，乱成一片。

很快，进旅馆的人出来了，拿着先前那个中年男子所带的公文包。远处

警笛响起，守在门口的人忙问：“得手了？”拿包的人神色焦虑：“情况不妙，东西不对……”话音未落，随着一声尖啸，一颗子弹穿入了他的胸膛，他一声闷哼，一头栽倒。守在门口的人大喊：“有埋伏，快撤！”几人飞奔向街角藏着的自行车。

猛然，对面茶楼二楼紧闭的窗口“砰”地打开，几支乌洞洞的枪口伸出，一时弹如飞蝗，在“三河屋”旅馆门口编织成死亡的火网。黑影们猝不及防，短促的交火后，被逐一撂倒。

雨下大了，路面上血水横流，空气中还弥漫着淡淡的硝烟。市民们早已远远躲开，只有身穿雨衣的日本宪兵和便衣特务在检视尸体。

一个满脸疤痕的宪兵军官俯身掰开死者牢牢抓紧的手，拿起了那个血迹斑斑的公文包。短短十几分钟，这个包便三易其主，打开后，里面却只是一叠旧报纸。

旁边的一名便衣说：“洼冢队长，干得漂亮。”

疤脸军官是日军上海宪兵队沪西分队的队长洼冢敦雄少佐。他把公文包随手一抛，就像扔掉一袋垃圾，扫视着地上的几具死尸，冷笑一声：“哪里，这只是个开始。”

“三河屋”旅馆柜台前中弹的那个中年男子仰面倒地，上身被打成马蜂窝，早已气绝，无神的两只眼珠仍定定地望着天花板，仿佛还没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儿。

“鱼儿上钩了，可惜鱼饵也咬掉了。”

“没什么可惜……这家伙当替身，还真是死不瞑目啊。”

几个拖尸体的宪兵嘟哝着。

“干掉的四个不过是杂鱼而已。”洼冢踢了一下那个中年男子的脑袋，伤疤累累的面容露出魔鬼般的狞笑，“如果不用替身，让正主儿来更好。”

接下来的几天，驻上海的日本宪兵队、宪兵教习队、特务机关联合成立了特别搜查班，在汪伪上海市警察局和“七十六号”特工总部的配合下，封锁了上海主要交通线，开始了全城大搜查，捉拿与刺杀者有联系的同谋犯，一时风声鹤唳，大街小巷到处张贴着刺杀者的相貌、所用自行车、所穿衣帽形制的悬赏令。

三个月后的一天，天边被鱼肚色的晨光染白。黄浦江上远远飘来一艘小



木船，是那种最常见的乌篷船。船靠在岸边，一个报童一路喊着：“看报看报，龙华寺花和尚陷阱！看报看报，国共华北内讧！看报看报，皇军海空大捷！”奔跑远去，人们行色匆匆，没有人在意这条小船。

船老大穿着白色短褂，叼着烟斗，朝岸上的一个小伙子招手：“上来。”

小伙子跳上船，一进船舱就闻到了一股浓重的血腥味。篷帘紧闭，只见舱底卧着一团影子，模模糊糊的，没什么动静。“哧”的一声，船老大擦亮了一根火柴，四周顿时清晰起来，船舱里躺着一个人。

小伙子打量那个躺着的人，那人穿大襟长衫，胸前已被血染成紫黑色，脸如白纸，戴着一副金边黑片眼镜，躺着一动不动，似乎没有呼吸。他有些惊讶，问船老大：“阿爸，这人……死了么？”

船老大摇了摇头，又点亮一根火柴：“受了重伤，还有气儿。刀尖药买来了吗？”

小伙子点了点头，从怀里掏出一个纸包：“崔拐子那儿抓来的。”

船老大接了药，又问：“来的时候后面没人跟踪吧？”

小伙子说：“没有，我小心着呢。这人是谁？”

“是我们的同志，我刚接到。受了枪伤，失血太多，什么话也说不出来，要连夜送到江北去，在那里才能找外科大夫取出子弹。眼下只好拿这些药外敷救急。”小伙子还想问什么，船老大一摆手，“我只能告诉你这些，这是纪律。”站了起来，“我去船头看一下，没有情况就开船了。趁这不颠簸的当儿，你给他换药，注意别弄疼他。”

小伙子凑近些，小心翼翼地去揭那人胸前已经被血浸透的纱布，没想到这人“嗯”了一声，似乎是被疼痛惊醒，一只手抓住了他的胳膊，只是无力地虚握着，嘴里发出了一阵含含糊糊的声音：“别动……子弹……是从背后打穿的……”说罢，手又无力地垂了下去，胸口起伏不定，像是突然恢复了呼吸。

小伙子不敢再揭，见那人脸上粘糊糊的都是汗水，说：“我给您擦擦汗。”

“不……水……”那人嘶哑着说。

小伙子赶紧倒了一碗水，送到他嘴边。他喝了一口，突然剧烈咳嗽起来，咳出来的都是血，把一碗水都染红了。船老大听到动静赶紧进舱，见小伙子身上都是血水，厉声呵斥：“你在干什么？”

小伙子惊魂失措：“他说要喝水……”

船老大一把推开小伙子，扶起那人，轻声问：“‘娄山关’，你怎么样？”那人张开嘴，却说不出话，喉结上下努力动着，艰难地吐出几个字：“有叛徒……大叛徒……”

船老大说：“先别多说，等过了长江，我们就给你找大夫。”

那人闭上了眼，将仅存的一丝力气积攒在右手，抬手指着怀里：“这里……”

船老大从那人怀里掏出一个小小的包裹，里面是一个扁圆形的东西，那是一颗象棋子，还有一封信，他不及细看，问：“谁是叛徒？信和棋子给谁？”

小伙子见这颗棋子有些奇特，拿起来一看，船老大拍了一下他的手，把棋子放了回去。

那人又开始咳嗽，吐着血沫，嘶声说：“告诉‘湘江’……延安有叛徒……很大的叛徒……”

就在这时，外面突然响起了“哒哒哒”的机枪声，刹那间，乌篷船被密集的子弹打得千疮百孔，船篷如同疾风暴雨中的纸盒一般分崩离析。船老大成了一个血人，他怒目圆睁，奋力将儿子推入水中……

小伙子刚张口喊“阿爸”，江水就没过了头顶，灌进了嘴里。他扎了一个猛子远远潜开，枪声依然在回荡，水面上铺开了大片像火又像血的颜色……

第一章

公安部长亲批的叛徒案

1949年10月1日，一辆美制吉普车卷起滚滚黄尘疾驰在晋中大地上，一路上都是黄土丘陵，间或有些绿色，那是种植高粱和玉米的旱地，三三两两扛着农具的人们正在劳作。这片饱经战乱的古老大地，终于恢复了期盼已久的和平和生机。

吉普车司机原是一位太原战役时的解放战士，军帽上还留着国民党帽徽摘除后的白印。他本来是个健谈的人，但一路上却很沉默，因为车上的三名乘客个个神情严肃，不苟言笑，显然肩负着重大使命，这种气氛下他不敢随意搭讪。

车上三人中，一人为太原市公安局的王政委，他只是陪同人员，另外两人从口音上听是南方人，看来都是干部，他们是去榆次县长凝镇的战俘管理所办案。那个战俘所又名“日本人教导大队”，里面关押的不是一般的俘虏，都是帮助阎锡山打内战的残留日军。司机心下嘀咕：“他们大老远跑来，究竟是什么重要的案子，还需要公安局政委亲自陪同？”

这两名来自南方的公安干部，年纪较大的那人名叫石瑞，年轻的名叫邱水才，他俩都是上海市公安局的侦查员。颠簸的车内，他们心绪不宁，一直在琢磨着案子，而这个案子，还要从几个月前说起。

1949年6月，上海刚解放，中央公安部、社会部便向华东局公安部、社会部发出了一份机要文件，要求对件内所注明的一起尚未侦破的悬案进行

彻底调查。这起悬案的时间发生于 1945 年，地点就在上海，因此，经华东局研究决定，交由上海市公安局调查此案。

上海市公安局立即抽调一批精干侦查员组成一个专案调查组，由政保处老资格的侦查员石瑞担任组长，邱水才等八人为组员。石瑞是从苏北老区南下的干部，抗日战争时期参军入党，在徐州和盐城等地从事过地下工作和公安工作，上海解放时参加接管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精明干练，经验丰富。邱水才是八名组员中年纪最小的一个，虽说不过二十出头，但参加革命已有五年，他是烈士之后，又是上海本地人，熟悉当地的情况，因此也被调入专案组。

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扬帆特意找石瑞谈话：“请注意，这是公安部长罗瑞卿同志亲笔批办的要案，他指示：‘你们要进行严密调查，争取早日侦破，务必要拿出一个准确的结果来！’”并告诉他，调查时支出的所有经费可以实报实销，专案组配备专人专车，这在当时属于“一类案件侦查待遇”。扬帆还说：“市委副书记及华东局社会部部长潘汉年同志也很重视这个案件，言明要将追查结果向上海市委及华东局呈递专项报告。”

当时并不太平，各地仍有大量暗藏的敌特匪帮在猖獗活动，他们勾结恶霸流氓，杀害干部群众，盗窃国家机密，纵火爆炸，扰乱金融，制造谣言，煽动闹事，肃清反革命势力的工作非常繁重。然而，在百忙之中，罗瑞卿和潘汉年仍亲自过问此案，所有的办案人员都意识到了这个案子非同小可。

该案的基本案情是这样的：

1945 年 4 月 14 日，上海的中共地下组织执行了一次代号为“利剑”的刺杀计划。这次行动的命令由延安的中央社会部直接下达，这是非常罕见的，因为多年以来我党的地下工作在原则上已不再采取暗杀这种斗争方式，可见行刺对象是一个有着特殊意义的人物，并要夺取此人随身携带的重要文件。但可惜的是，“利剑”计划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在于：组织的内部出了叛徒！这个叛徒造成的危害极大，因为他的告密，不但参与“利剑”计划的行动小组成员全部牺牲，敌人还顺藤摸瓜展开了拉网式大搜捕，导致我们的同志先后牺牲二十四人，被捕五十八人，使得抗战胜利前夕的上海地下工作一度陷入瘫痪。那真是黎明前最黑暗的一刻。

然而，这个身上背负着数十条人命血债的叛徒，却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惩处。

“利剑”行动失败，令延安震动，地下组织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展开了调查，像这样机密的行动，知情人是很少的，采取人人过关的方法一一摸排，很快便锁定了一个可疑的人物——段传邦。

段传邦，党内代号“乌江”，山东烟台人，原是杂货商人，1942年起开始和滨海、胶东、渤海等抗日根据地做生意；经我方政工人员开导教育，思想逐渐进步，1944年10月秘密入党，并来到上海发展生意。“利剑”计划中，段传邦凭借身份的便利，负责安排行动组的食宿（行动组员是新四军根据地选派来的擅长枪法格斗的战士，不是上海本地人，公开住宿容易暴露），因此他能掌握队员们的人数、出行时间和规律，虽然计划的主要部分对其保密，但通过对行动组的暗中窥听和推测揣摩，他完全有可能得知内情。“利剑”计划失败后，段传邦随即消失过一段时间，后被活动于浦东地区的新四军游击队逮捕，经过审讯，段传邦对自己的叛变事实供认不讳，旋即又狡猾地逃脱，从此去向不明，仿佛人间蒸发一般。

此案调查的目的，就是查出大叛徒段传邦的下落，并将其绳之以法。因为这个案子始于1945年的4月14日，局里将其定名为“四一四大案”。

专案组的组长石瑞接受任务后，从局里调取了华东局公安部转来的卷宗。他一拿到手里就直观地掂出了这个案子的调查难度：卷宗袋轻飘飘没一点分量！打开一看，果不其然，就是一份材料，两页纸，是关于该案案情的简单介绍，下面倒是盖着中央军委公安部、中央社会部的大印。

叛徒段传邦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行事十分神秘，这在地下活动时期自然不会引起同志们的注意，但现在回头再看，则有许多可疑之处。段传邦自述是山东烟台人，山东大部分地区解放较早，烟台、济南等地的公安机关早已按照中央关于此案的指示进行过连续数月的调查，没有发现他的踪迹。段传邦在烟台不但没有家口，奇怪的是居然连一个亲戚也没有；更奇怪的是，解放前所有的户籍记录上均查无此人，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户籍管理不规范尚情有可原，但日伪时代大搞“治安强化”运动，有严格的户籍保甲制度，这就说不通了。公安人员走访调查了过去与段传邦有过接触的人，其中有他的邻居，也有生意上的相识人，但只了解到一些支离破碎甚至是互相矛盾的情况，比如有人说他很能喝酒，有人则说他滴酒不沾，性格也是模糊不清，这样的信息可信度大打折扣。甚至连一张段传邦的照片都找不到，他曾经营

了一家名为“裕和”的小商社，有一年中秋吃团圆饭请照相馆的师傅拍了一张商社的全家福，偏偏这个当老板的推说伤风感冒没有出席。不过，这些被调查者倒是一致认定段传邦去上海后就没有再回过山东。就这样，调查的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到了上海公安局身上。

侦查员们传阅了“四一四大案”的卷宗后，便研究怎样着手进行调查。

当时的上海拥有四百多万人口，是全国最大城市，三教九流在此鱼龙混杂，段传邦仍有可能在此隐匿藏身。上海解放后，各方面的秩序恢复得很快，一周之内各政府机构职能部门就已经建立了，逐步推出了一套套管理措施。鉴于段传邦的反革命身份，专案组认为他有可能在解放后根据市军管会的通令向公安局进行过“历史身份登记”，这是可以追查的一条途径；此外，只要段传邦没有离开上海，仍是上海市居民的话，那么他的户口应当可以在上海的某个派出所查到，因为上海的户籍管理一直较为规范，而且解放伊始就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查整顿。段传邦为逃避处罚，肯定早已改名换姓，需要耗费比较大的力量进行追查。但不论属于哪一种情况，目前都可以采取一个通用的办法进行初步查摸，那就是向各分局下发“协助调查函”，注明段传邦的如下特征：男性，三十多岁，山东籍，1944年来沪，商社老板，当年的商号叫“裕和”。

于是，专案组起草了“协查函”，送办公室打印后一一盖章，然后交由机要通信员专门分发到全市黄浦、虹口、静安寺、江宁、提篮桥、长宁、普陀、杨树浦、徐家汇、闸北、大场、江湾、新泾、真如、吴淞等三十一个公安分局及水上公安分局，由各公安分局对追查段传邦之事分别作出具体安排布置。

各公安分局接到市局的“协查函”后立刻执行，下发到了分局各相关科室以及每个派出所。当时的办公条件极为简陋，靠的都是手写，然后就是大脑储存。派出所的户籍警很多是国民党时期的留用人员，这些经过严格筛选得以留用的人都是没有恶行而且有些本事的，对于本辖区管段内的居民都有清晰的记忆，即使半夜三更把他从沉沉大睡中唤醒后问管段里的某个具有特殊身份的居民，也许他眼睛还没有完全睁开，但嘴上已经能够作出回答了。各分局的效率很高，在五天时间内就完成了调查，陆陆续续上报到市局专案组来的一份份材料上，有四个分局报称发现了六名可疑对象。可疑对象就是线索，接下来就轮到专案组侦查员上场一显身手了。可令人失望的是，

八名侦查员折腾了数日，四处奔波内查外调下来，最后发现这些对象都不是段传邦。

还有一条线索。

1945年，段传邦曾被浦东新四军游击队淞沪支队逮捕过，一位名叫葛方的区队长主持了对他的审判，找到葛方应该能够了解一些详情。专案组向葛方所在部队发出专函，得到的回复还是令人失望：抗战胜利后国共签署《双十协定》，淞沪支队奉命渡江北撤，后编入华东野战军，葛方在孟良崮战役中受了重伤，因医疗条件太差，伤口感染去世。

动荡的战争年代，查清一个人的来龙去脉是很不容易的，情况特殊的地下战线尤其如此。由于手头掌握的情况实在太有限，石瑞便向局里提出请求，能否会见一下当年地下工作中段传邦的上级，当面了解情况。这时全国还有不少地区未解放，按照组织规定，这些秘密人员的姓名、地址，许多仍不能透露给任何人，只能由与其建立组织关系的上线向其进行调查。

这个请求得到了上级的批准。

参与“利剑”计划的地下工作者的代号，以红军长征中历次重大战役战斗命名，如“湘江”“娄山关”“泸定桥”“乌江”等等，“乌江”就是段传邦，而其中资格最老的是“湘江”，真名叫赵景宋，此时已调入中央军委公安部。

于是，石瑞和邱水才带着华东局公安部开具的介绍信，登上了开往北平的火车。石瑞以前见过赵景宋，知道他是一位参加革命二十年之久的老资格的地下工作者。1949年初华东局开办公安干部学习班，赵景宋作为情报和反特工作的前辈给学员们讲过课，石瑞就是学员中的一名，对他的印象是：烟不离手，不苟言笑，思维敏捷，目光敏锐，无形之中有一种威严的压力，但在下级面前，他又有意淡化这种压力。

赵景宋正在参加一个重要会议，他事先已接到过上海拍来的电报，知道这个案件的重要性，便在开会间隙会见了石瑞和邱水才。尽管认识，石瑞仍然出示了介绍信和工作证，简短寒暄几句后，说明了来意。

一谈到这个叛徒段传邦，虽然时隔多年，赵景宋依然怒形于色，拍着沙发的扶手说：“可恨！”

他用火柴点燃了一支烟，深吸一口：“我和段传邦是相识的，算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因为他的叛变，给我造成过一些负面的影响。所幸组织上调查

清楚，这些影响都过去了。但是，”他说到这里加重了语气，“他的叛变所造成的恶劣后果，是无法从历史上抹去的！这也是我毕生无法抹去的污点！每当想起那些因此牺牲的同志，我就为自己当年的失察悔恨不已。”

看来，段传邦叛变对赵景宋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请您仔细回忆一下他的情况。”石瑞说完，邱水才马上打开了速记本。

“你们现在了解到些什么情况？”赵景宋反问。

石瑞把调查情况说明了一下。

赵景宋说：“我所掌握的情况，其实并不比你们多多少。我先说，如果需要出具书面材料，那我会亲笔写出来的。这是要存档备案的，不容草率。”

稍加回忆后，他继续说：

“我和段传邦认识是在1942年冬天，当时我在山东分局负责敌工工作，是经一个地下党员介绍认识他的，这位同志的公开身份是莱阳一所小学的教师，名叫董向平。在那一年，日寇对各个抗日根据地展开了大规模‘扫荡’，比如富饶的冀中根据地就是在‘五一大扫荡’时被完全破坏，山东几个根据地的损失也很大，部队只好转移到了山里。入秋后天气越来越冷，山上缺吃少穿，没有棉衣，过冬很成问题，晚上战士们只能挤在稻草堆里取暖，一个班只有一床棉被，轮流让上岗的战士披。这时，董向平和我联系，说有一个叫段传邦的烟台商人，经常来往于青岛和济南等大城市，路子广，还懂日语，与日本商家有来往，能搞到棉花。我经过接触，发现段传邦的思想有进步的一面。他是苦出身，他家是全村最穷的贫雇农，幼年时家乡遭了灾，父亲丢下家人去闯关东，母亲被村里的一个恶霸欺负后投井自尽，妹妹活活饿死，他从小就有阶级仇恨。我汇报组织征得同意后，便让段传邦试试，他果然搞来了一些棉布和棉花，解了燃眉之急。此后，又请他帮助根据地秘密购买电池、电话线、炸药原料、工业器材等紧缺物资，好几次都成功了，就这样建立了信任。

“段传邦得知我的真实身份后，表现出积极向党靠拢的意愿。应该说组织上还是慎重的，两年来一直在考察他，没有发现问题。于是，经我介绍，段传邦在1944年秋入党，成了一名地下工作者。他去上海发展生意，也征求过组织上的意见，因为抗战形势正逐步转好，党的力量要从农村向城市发展，根据地还特意筹措了一笔资金给他送行，他的组织关系由山东转到了上海。没想到，就在抗战胜利前夕，他居然叛变投敌，给我们造成了这么大的

损失！”

赵景宋说到这里连连摇头，既有懊恼也有痛惜。

石瑞问：“段传邦叛变后，采取过什么制裁措施吗？”

赵景宋烟瘾很大，抽完一支烟，又接上了一支：“‘利剑’行动失败后，段传邦失踪了，很可能是被日伪方面庇护起来了。当时上海的地下组织正处于风口浪尖，要制裁这个叛徒，难度之大不可想象，虽然采取过某些措施，但都没有什么效果。段传邦曾被淞沪支队逮捕过，本来是个可遇不可求的良机，但游击队没有看管好，让他溜走了。抗战胜利后，山东、上海两地的地下组织都打听过这个人的下落，但都没有结果。地下组织受条件的限制，无法进行大规模的深入调查，况且，他们还有许多艰巨的任务，不可能为此投入过多的力量。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这桩悬案一直拖到了今天。”

石瑞想了一下，问：“董向平同志现在何处？”董向平是最先和段传邦认识的，或许能提供更多的细节。

“董向平在1945年牺牲了。莱阳县委让他去送信，路上遭遇到了敌人，他为了保护密信被敌人杀害，尸体第二天才在河滩上被发现……”赵景宋深深地叹息了一声。

“那么，还有了解段传邦的其他同志吗？”

“比我更了解的……据我所知，没有了。我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嘛。”赵景宋苦笑了一下。

石瑞是个思维缜密的侦查员，又问：“段传邦叛变后，既然处于日伪庇护之下，怎么能让淞沪支队逮捕？他又是怎么逃脱的呢？”

叛徒叛变后，由于害怕昔日的同志对他进行制裁，就会千方百计地出力把他原来的组织破坏掉，而且由于担心自身的安全，会变得比往常更加敏感多疑。从掌握的段传邦的情况看，这是一只狡猾的狐狸，居然让活动于浦东地区的游击队捕获，倒真有些奇怪。

赵景宋眉头锁紧，沉吟了一下，说：“如果葛方同志还在，他应该能回答你的问题。”

“段传邦这个人的相貌特征如何？我们到现在都还没找到他的照片，您这儿有吗？”石瑞有些惭愧地说。

赵景宋说：“我这儿也没有。”

石瑞有些失落，却见赵景宋站了起来，把纸烟熄灭，说：“你们等一下。”

赵景宋取来了一张白纸和一支铅笔，“刷刷”地画了起来。很快，一张标准的肖像图出现了。画完，他递给石瑞：“凭记忆画的，大差不差，做个参考吧。”

石瑞见图上的人五官清晰，眉目传神，栩栩如生，连右侧眼角眉间的一颗黑痣这样的特征也描绘了出来。他又惊又喜：“没想到您还有这样一手。”

赵景宋把烟蒂重新点燃，说：“以前学过一点儿人物素描，这个在工作上也用得着。”

石瑞还想询问一些“利剑”计划的细节，比如，刺杀的对象是谁？要夺取的是什么文件？

赵景宋答曰无可奉告，因为这些仍未解密。

就在谈话间，赵景宋已经接了好几个电话，谈的都是公事。北平即将举行开国大典，各种敌对分子都虎视眈眈地盯着这个日子。就在两个月之前，南苑机场的四架解放军飞机被国民党空军的轰炸机炸毁了，这四架飞机是刚刚调来保卫首都的，没想到一到就被敌特发现并向台湾报告了。由此可见，要确保中央首长的绝对安全和庆典活动的顺利进行，保卫机关的任务十分艰巨。

石瑞感到问得差不多了，不便过于打扰，便向赵景宋告辞。

赵景宋说：“如果案子有了结果，在方便的情况下，请告知我一声。”

石瑞答应了，立刻拿着这张肖像画去了北平市公安局。他请公安局的同志用照相机拍下了这张画，洗印了好几张，准备带回去分发给其他小组的同志。

“四一四大案”专案组有八人，两人一组分为四个小组，石瑞和邱水才去了北平，其余的小组也在忙碌着。他们兵分几路奔赴各个监狱，从抗战时期就在上海活动过的在押犯人开始展开调查，看看有没有人认识或是听过“段传邦”这个人的，这些犯人中相当一部分是在历史上犯下严重罪行的反革命分子、汉奸、恶霸、叛徒，数以千计，工作量很大，如果有肖像参考，那么就事半功倍了。

这天晚上，石瑞突然被身边的动静惊醒。只见邱水才从床上坐起，双手抱头，两眼圆睁，额头大汗涔涔的，“呼哧呼哧”喘着粗气。他关切地问：“小邱，又做噩梦了？”